

範圍。在地域上未考慮同樣以政治活動中心為基點建立新祖塋，具備權力身分認同構建性質的北朝士族歸葬行為，亦不足以涵蓋士族整體。

儘管本書還有一定的增益空間，但不可否認的是，作者使用豐富文獻資料、考古實物和人類學理論所進行的深度士族個案研究，超越了僵化的個案研究範式。考古學、歷史學及文學等多元材料和跨學科理論的運用，使本書深入觸及東晉南朝士族的精神世界，這種側重於士族「習俗、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以「新文化史」文本細讀與深描的形式進行的士族研究是一重大創新，向學界展示了超越譜系、仕宦、婚媾與地域等舊視點的深層士族特質，更新了士族研究領域的學術模式與活力，對後來學者有着重要的啟迪意義與學習價值。

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民族學院

孟承儒

魯大維著，祁逸偉譯，《稱雄天下：早期明王朝與歐亞大陸盟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324頁。

本書英文版 *Ming China and its Allies: Imperial Rule in Eurasia* 於2020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魯大維 (David M. Robinson) 是美國柯蓋德大學教授、普林斯頓大學博士，早年研治明代華北盜匪和地方暴力，開始觸及京畿「達官」等族群關係問題，既而以區域比較視野進入遼東，在當地社會連續性中體味到元、明間歷史關聯，並從遼東與朝鮮半島的密切互動出發，注意到蒙古帝國劃時代區域整合的意義，將研究推向元、明中國在歐亞大陸的歷史地位問題。本書是作者繼 *In the Shadow of the Mongol Empire: Ming China and Eur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之後，探索該論題的又一成果。

緒論指出，與域外「遠人」(people from afar) 的交往是明初帝王行使統治權的關鍵因素。皇帝通過「遠人」的結盟或臣屬，以「眾王之王」身分在未能直接控制的廣闊地域施加影響。作者主張在更宏觀的空間背景下理解明朝的統治：15世紀前期的東部歐亞是「成吉思汗後裔的世界」，崩解後的蒙古帝國仍具廣泛號召力，贏得蒙古貴族的效忠對明朝相當重要。

正文分為5章。前兩章聚焦於朱棣及其北征。第一章提出，朱棣的燕王經歷使他熟悉草原的形勢、歷史與文化。登基後，他積極搜集外部情報，不失時機地反復勸誘草原領袖認可明朝已代替元而獨佔天命，甚或挾軍事勝利重塑草原景觀，以確認明朝的統治權。通過向盟友以及軍中蒙古人施恩，朱棣將自身權威「嵌入了成吉思汗後裔世界」。第二章則利用文臣記述，勾勒皇帝、文臣與蒙古精英在王朝統治中的互動。文臣熱衷於歌頌北征，積極宣傳元亡明興的合法性，卻不盡贊成朱棣與草原人群的交往。皇帝與蒙古貴族保持密切私人聯繫，盡顯「內亞」形象，而文臣著意將蒙古人「邊緣化」，以消除他們在族群文化和政治利益上的威脅。

第三章通過也先土干家族的案例，進一步討論皇帝與蒙古精英的關係。也先土干在朱棣的第四次北征中歸順，其家族自永樂至正統四朝備受恩寵，屢建功勳。朱棣高度重視吸納蒙古精英進入明朝政權，曾委派楊榮、陳懋等親信負責相關事宜，因為他們的歸順提升了皇帝招徠「遠人」的威望，並發揮實際政治、軍事效用。

第四、五章的核心論題是土木之變。競逐成吉思汗遺產是15世紀明廷與瓦剌的共同追求，事變前後的事態發展對此有充分體現。瓦剌自詡成吉思汗後裔，利用故元與中亞、東北、朝鮮地區的政治、宗教、婚姻紐帶鞏固權威，甚至一度採用大元國號。明朝則堅決否認瓦剌與故元的統緒關聯，強化與各小政治體的朝貢關係。雙方不惜投入顯著成本，持續向盟友「再投資」，以期與對方抗衡。英宗被俘後的經歷還體現出雙方對於統治正當性的來源、君臣道德規範存在「共通性」認知。

結論再次強調，早期明朝絕非傳統印象中的同質化「華夏」政權，皇帝主動採用當地精英所認同的「內亞」身分推廣統治。由此，作者反思了「新清史」關於清朝統治模式獨特性的論述，意圖說明統治者與「遠人」的交往是東部歐亞歷史的一個恆久特徵，元、明、清三代的統治策略存在連續性。

本書致力探究早期明朝如何在邊疆以至更遠的地區行使統治，超越聚焦漢地政治的傳統論述，提出諸多新穎論點。第一，15世紀前中期的東部歐亞具有顯著的相互關聯性。廣袤大陸上曾經歸屬於蒙古帝國的不同人群建立起大大小小的眾多政治體，抱持不同利益訴求，同時與明朝和蒙古發展關係。作為明朝最親密藩屬的朝鮮，曾在官方文獻中稱鬼力赤為韃靼皇帝（頁50）。也先稱汗後還致書朝鮮，期望恢復元、麗舊交（頁186）。明代的外部形勢波譎雲詭，思考其統治權的開展，必須不斷切換視角，關注各方動向和

影響。第二，明初發展朝貢關係，並非炫耀靡費之舉，而在政權統治中發揮實質作用。作者認為，招撫「遠人」利於穩固內政，世界各地的君主普遍希冀樹立統制內外的精神權威。（頁3）從外部效用着眼，周邊歸附人群構成了王朝的安全屏障，且成本遠低於直接統治，如在與青海、甘肅部落的朝貢關係中，明朝要求提供商人、使團的安全通道（頁226）。被保護的使團往往又承擔傳遞域外情報，供皇帝判斷局勢的重任，這是明初皇帝十分關心的（頁35）。第三，明初帝王行事帶有鮮明「內亞」風格。無論是親自狩獵並賞賜麾下「胡兒」生啖羊肉，在內廷烹煮老虎的朱棣（頁94、121），還是帶領少數精銳深入敵營斬將奪旗的朱瞻基（頁143），抑或意欲效法乃父乃曾祖親征的朱祁鎮（頁180），乃至向以儒家賢君著稱，卻愛好豢養野獸的朱祐樞（頁272），都顯露出區別於一般敘事的新形象。

「成吉思汗後裔世界」是本書的重要概念。作者準確把握了明初統治中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元朝的正統性問題。對明朝而言，元朝是一個極為特殊、前所未有的「前朝」：其一，元朝實質統一了傳統政治觀點中判然兩分的草原和漢地；其二，元朝統治者保留了鮮明的本民族特性。遊牧民族入主中原以後，草原往往成為「游牧制度的貯存地」，醞釀與漢化政權敵對的全新游牧力量。（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375—376）但元朝漢化不深，北境並未形成新的統治力量，統治者得以安然復歸草原。明朝在漢地結束元朝統治，號稱「一統」，卻依然面對名亡實存的「前朝」，必須應付兩方面的問題：第一，如何使人們相信依然存在的元朝實質上已經「滅亡」了；第二，如何從故元疆土中界定明朝的「一統」疆域。本書解析了朱棣與鬼力赤、本失雅里的通信（頁46—49），以及諸多文臣奏議、詩文，從中歸納出草原蒙古人是元朝血緣後裔，而非政治後裔，明朝代替元朝得天命的敘事框架（頁247），並講述朱棣在草原銘刻帶有征服性質的文字（頁58—61），搗毀李陵臺蒙古官員碑刻以確認此處歸屬漢地的事蹟（頁90），為以上問題提供了部分解答。明朝對蒙古帝國的復活始終保持警惕，反復宣傳「虜勢衰微」（頁92），部族領袖小具氣象，即會引起「其志不小」的擔憂（頁176），以致明中後期對正常通貢亦抱疑慮。「故元記憶」這一與明朝相終始的課題還有待進一步探索。

對於蒙古人而言，蒙古帝國崩解的意義是複雜的。一方面，元朝與各政權的個人聯繫大多隨其敗歸草原而瓦解了，東部歐亞重新洗牌。蒙古民族本身也陷入分裂當中，為明朝實行拉攏結盟提供了契機，「天教戎狄自相殘」

為朱棣所樂見（頁102）。另一方面，元朝統治家族的式微為某些部族帶來了機遇，瓦剌重新擁立阿里不哥一系登上汗位就是例證（頁181）。新興力量在成吉思汗旗幟的感召下再度追求草原的統一，乃至更大範圍的整合：「比先大元皇帝一統天下，人民都是大元皇帝的來」（頁188）。蒙古政權在草原的復興帶來了東部歐亞的多極性（頁204），這是各小政權得以選擇盟友的重要前提，也是明朝招撫「遠人」的背景。關於明代蒙古，作者還提出一個頗有見地的看法：各政治體在競逐成吉思汗遺產的對抗中反趨同化了。（頁177）例如也先的統治範圍向西延及中亞，為了團結他的盟友，從明朝獲取資源勢在必行（頁203），這種政治需要將蒙古和明朝捆綁到同一張貿易網絡中。蒙古人通過帝國統治的經驗體會到了政治共同體對於維持秩序和權威的好處，更大的組織有利於他們從南方攫取更大的利益，而更大的利益帶來分配和存儲的問題，拉鐵摩爾曾論述的「移動—管理權」矛盾再一次突顯，終於出現了部分放棄流動習俗，築城以儲財立威的俺答汗（《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頁54—57、60）。作者的看法與此遙相呼應。

作者在資料的運用處理方面也頗有值得借鑑之處。作者提醒讀者注意文人記錄中潛藏的集體偏見。他在辨析土木之變的實際傷亡數字時，指出文臣為排抑武臣、宦官而採取誇大的敘事技巧，隱沒明蒙交涉的重要事實和皇帝的原本構想。（頁180）本書還大量使用《朝鮮王朝實錄》等域外史料和蒙、藏少數民族文獻，從《青史》發掘朱棣「燕王」身分在邊疆的歷史餘音（頁33），運用《蒙古源流》佐證蒙古人眼中的朱祁鎮形象（頁238），均融會記憶與史實兩端，帶來不同啟發。

上述優長之外，本書尚存在一些可堪商榷的問題。本書以「Eurasia」描述明朝政治秩序的影響範圍，未免太過寬泛。作者批評將西方擴張與明朝內縮相對應的論調（頁6），有意識地將早期明朝納入全球化視野。但是本書重在分析明朝與蒙古貴族的關係，間或提及朱棣對中國西藏、越南，以及東南亞的經略，也只是泛泛而論，用以彰顯朱棣的外擴雄心和對待「遠人」方式的共通性。明初的世界格局與中後期相比也是顯著不同的，明初帝王確實與更遠的西亞、歐洲有所往來，如朱元璋曾向東羅馬宣告登基，但此地在他們看來已經是「隔越西夷」（《明太祖實錄》，卷67，洪武四年八月癸卯，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頁1267）。撥動清代歐亞大陸局勢的至要力量俄羅斯尚未崛起，西歐通向東方的「新航路」也未開闢，與蒙古汗庭僅存宗親之實的金帳汗國之類成吉思汗後裔亦未對明初統治造成顯著影響。套用全球化語境，為時太早。

作者在分析皇帝與「遠人」的關係時，將朱棣軍中的蒙古人、內附蒙古人和外部蒙古人一概置於「遠人」範疇，也不盡合理。明朝政權內的蒙古人日益融入漢人社會，乃至明朝官僚體系，脫離與原有根據地的聯繫，是否還能視為發揮效用的「遠人」，頗堪思量。作者在第三章也曾談到這一問題。（頁150）即使生活在邊境地帶的蒙古部族，還有多少到土木之變時仍保留原有社會組織，也需細化討論。內附蒙古人的命運倒是可以當作反映華夷觀念變遷的一面鏡子，天順以降，越來越多的文人將他們視為政權內的異質性因素，必欲清除而後快（例如《明英宗實錄》，卷193，景泰元年六月庚子，頁4066）。這是明中後期統治思想與前期差異的又一證據。

最要害的問題是，內亞因素是否對明朝政治產生了結構性影響？其一，朱元璋確定的明朝邊防戰略基本以安定近邊為指歸，幾次深入塞外，也是為了確保沙漠以南無大股敵人活動，甚至批評時為燕王的朱棣巡邊塞外為冒險之舉，並詳細闡述了依靠城壘烽堠體系開展防禦的必要性（《明太祖實錄》，卷252，洪武三十年六月庚寅，頁3655）。朱棣的北征似乎並未顛覆這一構想，至少他公開宣稱的戰略目標仍是降服「殘胡」，保證邊境安寧（《明太宗實錄》，卷104，永樂八年五月丙戌，頁1351），當年太祖的批評意見亦保存於《實錄》。這種連續性也符合明人關於元人「北遁沙漠」而朱棣「驅逐愈遠」的印象（《明孝宗實錄》，卷75，弘治六年五月戊寅，頁1426）。朱棣特殊的個人作風究竟是否影響到了明朝的總體對外方針？其二，朱棣布置「華夷」秩序時的參照系是什麼？我們固然無法忽視成吉思汗帝國的持久影響，但朱棣的野心與元、清的核心差異在於，元、清意圖通過君主個人聯繫將更廣大的地域納入版圖，朱棣則只追求政治上的影響，看起來更像傳統「華夷」天下觀的延續。論者或以為朱棣懸李世民的成績為鵠的，或視朱棣為忽必烈的繼承人，癥結即在於此。其三，推而言之，明朝君主的「內亞」特性是否融入了明朝的政治文化？朱棣生長北邊，後又藉重蒙古軍靖難的極端特殊性使得他與蒙古人親密關係的後世持久性存在令人生疑的一面。誠然，明朝諸帝多有一些可以歸結於「內亞性」的愛好，但明初東部歐亞普遍影響力由盛而衰的轉捩點似乎不完全在土木之變，朱高熾暫停下西洋，朱瞻基遠征漠北卻放棄安南，北邊防線亦有所內撤，帝王的個人好惡是否能夠等同於「內亞」野心？朱祁鎮親征的意圖也值得商榷。正統十四年的也先進犯起初規模甚小，皇帝卻大張旗鼓加以討伐，既不同於朱棣主動進取的態勢，有無戰略考量也需再做分辨（川越泰博，〈土木之變と親征軍〉，《東洋史研究》，2003年，第1號，頁24—55）。皇帝個人武功與國家

邊防整體內縮的張力需要做出更合理的解釋，未來研究應當在本書基礎上繼續向明中後期推進。

概而言之，本書受到美國「新清史」、日本「大元史」的影響，重視君主通過個人關係建立多民族聯合政權的過程與方式，關注蒙古帝國的世界性長期影響，又在內容上反撥上述思潮，突破了多元清朝與一元明朝、明朝相對元朝轉入內向的扁平化敘事。明朝的「內亞性」此前並非無人關注。邵循正（〈有明初葉與帖木兒帝國之關係〉，載《邵循正歷史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頁86—98）已指出永樂帝在西域隱然踵武元室「而為蒙古帝國之中心」，今人鍾烜（〈簡析明帝國的內亞性：以與清朝的類比為中心〉，《中國史研究動態》，2016年，第5期，頁36—42）亦舉出明清「內亞」統治策略的若干相似之處。作者則將其發展為一種獨特的分析視角，為明代政治史、民族關係史、國際關係史研究開闢新路徑。雖有不足之處，仍不失為一部佳作。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楊曉銳

張瑞威，《想吃好的：明清中國的稻米種植和消費》，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4年，204頁。

人類「創造歷史」，須先能夠生活，而能夠生活，則須解決維持人類生命的食物供給及營養物質來源。稻米作為供給營養物質的農作物之一，歷來深受農學研究重視，與稻米相係的話題在歷史學領域則多集中於米價、米穀貿易、賑災調劑等政治經濟研究範疇。今張瑞威《想吃好的：明清中國的稻米種植和消費》一書從社會生活出發，將研究目光放置在明清稻米的種植與消費，通過華南與長江中下游地區時人對主雜糧的取捨及對稻米口味的追求，進一步探討影響明清長途稻米貿易的關鍵因素。

該書緣起於作者對20世紀50年代江南人和廣州人選食稻米及其歷史邏輯的關注，問題緣起部分梳理了作者對江南、華南地區稻作農業的現實關懷，即江南稻米供食之況以及華南城市人口對食用稻米的堅持與追求，繼而追問「主雜糧之取捨基於何種考量因素」、「消費者對稻米品種與口味的追求如何影響區域性長途米糧貿易」。